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缩小民族地区 与沿海地区收入差距研究

邢春娜 唐礼智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针对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进行分析。利用泰尔指数测算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收入差距, 通过面板数据考察转移支付对两地人均收入的影响, 并根据似不相关回归检验影响程度差异。研究发现: 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收入差距在2004年后呈逐年扩大趋势; 转移支付对两地人均收入增长都有显著促进作用, 对民族地区人均收入的拉动程度显著低于沿海地区, 一单位转移支付为民族地区带来的收入增量不足沿海地区增量的四分之一。因此, 要切实缩小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收入差距, 应调整转移支付资金结构, 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比重, 并改变现行税收返还的分配方式。

关键词: 转移支付; 民族地区; 沿海地区; 收入差距; 泰尔指数

中图分类号: F06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59 (2019) 02-0168-04

DOI编号: 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9.02.033

A Study on Reduc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Coastal Areas by Central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XING Chun-na TANG Li-zhi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impact of transfer payments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on income gap between ethnic minority and eastern coastal areas since the tax allocation reform. Theil index was applied to measure income gap between two areas. After examining influence of transfer payments on per capita income using panel data, it evaluated influencing difference by the seemingly uncorrelated regression. Research finds that income gap has been expanding after 2004; transfer payments significantly promote per capita income growth in both areas, but one unit effect to ethnic minority area is less than to coastal area.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duce income gap between ethnic and coastal areas, government should adjust transfer payments structure, increase proportion of balanced transfer payments, and change current distribution form of tax return.

Key words: transfer payments; Ethnic Minority Area; Coastal Area; income gap; Theil Index

一、引言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 自治区和多民族省份大多处于西部地区, 地理位置的局限和历史上的长期封闭使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发展相对缓慢。

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民族地区发展, 国务院从2000年开始实行民族地区转移支付, 2001年起中央财政设立了边境地区转移支付, 补助包括云南、西藏、甘肃和新疆在内的9个陆地边境省

收稿日期: 2018-12-30

[作者] 邢春娜 (1981-), 女, 辽宁铁岭人,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经济统计, 投资经济; 唐礼智 (1970-), 安徽马鞍山人,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投资经济、政策量化评估。

区以及8个沿海省市；2006年将非民族省区及非民族自治州管辖的民族自治县也纳入转移支付范围，建立转移支付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重点增加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等的转移支付力度，2017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总额为704亿元，比2000年增加678.47亿元，年平均增幅达21.5%。

随着中央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规模不断扩大，这一政策在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同时，是否缩小了民族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收入差距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目前，转移支付的相关研究在内容上主要集中于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收支、公共服务、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其缩小地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马拴友和于红霞（2003）认为转移支付没有缩小并反而扩大了1995—2000年的地区间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在于转移支付增长速度落后于人均GDP增长速度和资金分配上的不合理^[1]；毛捷等（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促进了民族县公共支出水平的相对增长，1999—2003年民族省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基尼系数比非民族省区下降4.53个百分点，但没有显著缩小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2]。彭定贇和王磊（2013）对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大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差异的分析发现，财政转移性支出的增加没有减小收入差距，转移支付可能扩大了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3]；但从健康和营养角度出发，解丕（2013）认为公共转移支付起到了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只是缩小不平等的效果小于私人转移支付^[4]。大多数研究不支持转移支付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赵红玉（2013）认为转移支付规模增大未缩小辽宁省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5]；雷根强等（2015）发现转移支付没有缓解西部地区居民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居民从转移支付获得收益的程度高于农村居民^[6]；赵为民和李光龙（2016）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格兰杰原因^[7]；储德银等（2017）认为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非线性，当转移支付从第一区制跨入第二区制后，影响由负变正^[8]。而迟诚（2015）的结论则显示政府间转移支付能够起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且作用效果随着政府间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非线性趋势^[9]。

上述研究主要从全国大地区或省际、县域角度考察转移支付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针对民族地区的研究较少且选取的数据时间跨度较短、样本容量小，难以充分说明转移支付对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本文讨论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区是处于我国西南腹地的自治区和少数民族省份，江浙沪三省市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历史上一直是富庶的鱼米之乡，通过两个地区的对比分析能够更加鲜明地反映转移支付政策对地区收入的影响和影响程度差异。

二、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收入差距

选取1995—2017年贵州、广西、云南、上海、江苏、浙江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数据，利用泰尔指数测算地区收入差距。泰尔指数（Theil Index）又称泰尔熵测度，是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计算收入不平等的一种方法^[10]。收入的泰尔指数是以收入份额为权重的加权平均：

$$T = \frac{1}{n} \sum_{i=1}^n \frac{y_i}{y} \ln\left(\frac{y_i}{y}\right), \quad (1)$$

其中 n 是人口总数， y 是总体平均收入， y_i 是个体 i 的收入。如果整体包括 k 个地区， T 可以分解为地区内部差异和地区之间差异两部分：

$$T = \sum_{j=1}^k \frac{n_j}{n} \frac{y_j}{y} \ln\left(\frac{y_j}{y}\right) + \sum_{j=1}^k \frac{1}{n} \frac{y_j}{y} \sum_{i=1}^{n_j} \frac{y_{ij}}{y_j} \ln\left(\frac{y_{ij}}{y_j}\right) = T_b + T_w, \quad (2)$$

T_w 表示地区内部收入差异， T_b 是地区之间收入差距， n_j 是地区 j 的人口数， y_j 是地区 j 的平均收入， y_{ij} 是地区 j 中个体 i 的收入， $j=1,2,\dots,k$ ， $i=1,2,\dots,n_j$ 。如果 $\ln(y_j/y)$ 小于零，说明该地区人均收入低于总体平均水平，或较多的人口占有较少的财富。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收入的泰尔指数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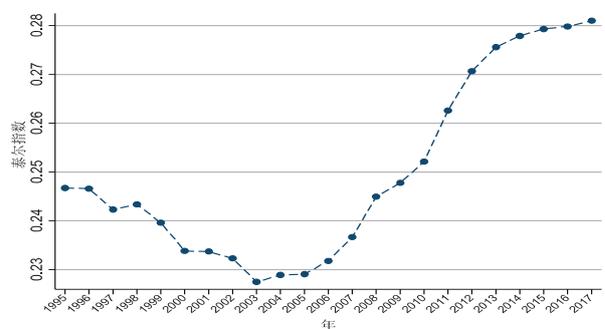


图1 两地区收入差距变化

从1995年开始泰尔指数呈波动下降,在2003年达到最小值,说明两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有缩小趋势,2000年开始实行的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2004年之后曲线表现出上行趋势,经过2005年的短暂调整,2006至2017年泰尔指数一直增大,表明民族地区和沿海地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

三、转移支付对地区收入的作用和影响程度差异

(一) 数据选取

将1995年—2017年贵州、广西、云南、上海、江苏、浙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除了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转移支付,还包括:(1)城镇化水平,用按户籍统计的各省份城镇常住人口(居住半年以上)占总人口的比率来表示城镇化水平;(2)对外贸易水平,进出口总额是以美元为单位计量的,将其乘以历年平均汇率换算成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3)教育水平,利用每十万人中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表示教育水平。

通过计算两地区人均GDP和解释变量历年平均值发现,从2002年开始,民族地区平均转移支付较前一年有明显增长,2005年之后民族地区平均转移支付高于沿海地区,2014年—2017年为沿海地区的2~3倍。民族地区的人均GDP和对外贸易发展水平明显低于沿海地区。2010年以前沿海地区的教育水平都是西南民族地区的两倍以上,而平均城镇化水平在2000年达到50%之后就一直高于民族地区。

(二) 转移支付对地区人均收入的作用

为避免价格因素和量纲影响,将人均GDP、转移支付、进出口总额关于基期进行平减(1995年=100)。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分析转移支付对地区人均收入的影响,引入代表不同地区的虚拟变量 D , $D_i=0$ 表示民族地区, $D_i=1$ 对应沿海地区。

$$gdp_{i,t} = c_i + \beta_1 trans_{i,t} + \beta_2 city_{i,t} + \beta_3 trade_{i,t} + \beta_4 edu_{i,t} + D_i + \varepsilon_{i,t}, \quad (3)$$

$trans$ 代表转移支付, $city$ 表示城镇化水平, $trade$ 和 edu 分别代表对外贸易和教育水平, $\varepsilon_{i,t}$ 是随机误差项。面板数据类型的豪斯曼检验显示民族地区和沿海地区的 p 值分别等于0.0000、0.0533,因此都适用固定效应模型。

表1 面板数据系数估计结果

变量	民族地区	沿海地区
转移支付	0.2285***	0.9476***
城镇化水平	391.9978***	371.8828*
对外贸易	-0.0291	0.1057**
教育水平	32.2604***	-7.2824**
常数	-153.6408***	-124.2568
R2	0.9563	0.9526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显著。

表1中是面板数据参数估计结果。从拟合优度 R^2 来看,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两地区数据。转移支付估计系数都大于零,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有助于提高民族地区和沿海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但民族地区估计系数低于沿海地区。城镇化水平和教育水平能够显著推动民族地区收入增加,对外贸易对民族地区人均GDP没有显著影响,这与民族地区地理位置相对闭塞、对外经济往来长期较少有关。城镇化水平和对外贸易拉动了沿海地区收入,教育水平估计系数小于零,说明教育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沿海地区人均收入增加。事实上,根据教育部官方网站发布的信息,截至2017年5月31日,江苏省的本科(含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数量都居全国首位,上海和浙江也有非常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地方财政的教育支出负担。

(三) 转移支付对地区收入影响程度的差异

采用基于似不相关回归的检验说明转移支付对两地区人均收入影响程度上的差异,首先去除个体效应,对两地区分别进行OLS估计,然后执行似不相关回归,最后检验不同地区估计系数之间的差异^[11]。从表2可以看出,两地区转移支付估计系数之间的差异在1%水平显著。由于民族地区估计系数为0.2285,沿海地区是0.9476,每增加1单位转移支付可以使民族地区人均GDP增加0.2285,明显小于为沿海地区带来的人均收入增加量。换言之,假定其他变量不变,当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总额是沿海地区4倍以上时,才能实现人均收入的等量增加。虽然近几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均值有较大幅度增长,却达不到沿海地区平均转移支付的3倍。因此,现行的中央转移支付政策没有缩小民族地区与沿海地区人均收入差距,反而有助于差距扩大。

表2 地区面板数据回归系数差异检验结果

检验对象	统计量	p 值
转移支付回归系数	152.73	0.0000
城镇化水平回归系数	4.86	0.0275
对外贸易回归系数	129.05	0.0000
教育水平回归系数	16.93	0.0000

目前，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主要由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构成，其中税收返还不具有均衡化作用。张冬梅等（2018）^[12]对5个民族自治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分析认为，民族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比全国其他地方有更大的财政自治权与自主性。税收返还是激励地方税收努力的资金转移方式，税收基数大的地区税收返还数额多，税收能力弱的地区得到的税收返还数额少，这种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式对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是不合理的。一方面，改革开放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直享有其他地区不具有的优惠税收政策；另一方面，民族地区产业竞争能力较弱、企业经济效益普遍偏差、农牧业生产水平低，经济增长速度慢，税收基数小，获得的税收返还总额偏低。2017年上海、江苏、浙江的税收返还总额分别为408.76、645.15和343.44亿元，在中央对本级财政转移支付中所占比例分别为70.59%、41.82%、35.79%；广西、贵州、云南得到的税收返还总额分别为221.92、184.08、333.33亿元，占当年中央对本级财政实际转移支付的比例分别是8.45%、6.68%、11.01%。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改革现行税收返还资金分配方式。转移支付制度还存在较明显的“基数法”色彩，采用全国统一无差别的税收收入划分与税收增量返还办法。一刀切的税收返还计算方法容易加重地区间财政失衡，扩大地区间贫富差距，不利于民族地区这样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对东部个别地区的长期税收优惠政策也阻碍了资源跨地区优化配置。宜用“因素法”取代“基数法”核算转移支付资金额，缩小依据“收入来源地”分配的转移支付资金；调整共享税的中央、地方分享比例，提高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地方分享比例；逐步实现税收收取待遇的均等化、缩小税收返还的地区差异化，真正发挥“转移支付”的作用。

第二，调整转移支付资金结构。一般性转移支付旨在弥补地区财力缺口、协调地区间财力差距，主要保证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实现地区

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等。专项转移支付主要用来均衡特定领域公共服务，重点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农等公共服务领域。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加重视公平性，有利于地方政府统筹安排财政支出、发挥民族地区财政自主性；专项转移支付更加突出效率，更好地体现中央政府意图，促进相关政策落实。鉴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沿海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应进一步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在转移支付中所占的规模和比例，特别是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比重，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减少或逐步取消不具均衡化作用的转移支付资金。

参考文献：

- [1] 马拴友，于红霞. 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J]. 经济研究，2003，(3).
- [2] 毛捷，汪德华，白重恩.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公共支出差异与经济发展差距[J]. 经济研究，2011，(S2).
- [3] 彭定翼，王磊. 财政调节、福利均等化与地区收入差距——基于泰尔指数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家，2013，(5).
- [4] 解垚. 市场力量、转移支付与收入不平等[J]. 财贸研究，2013，(6).
- [5] 赵玉红. 财政转移支付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J]. 经济纵横，2013，(9).
- [6] 雷根强，黄晓虹，席鹏辉. 转移支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我国中西部县域数据的模糊断点回归分析[J]. 财贸经济，2015，(12).
- [7] 赵为民，李光龙.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2016，(6).
- [8] 储德银，迟淑娴，纪凡. 中国式分权、转移支付与居民收入不平等[J]. 财经论丛，2017，(6).
- [9] 迟诚. 中国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基于转移支付的门槛效应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2015，(11).
- [10] Theil, H.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Theory.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67.
- [11] 连玉君，廖俊平. 如何检验分组回归后的组间系数差异?[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7，(35).
- [12] 张冬梅，李茂生，吴凡. 中央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的效果评价与调整建议[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8).

(责任编辑：卢丽娟)

(责任校对：小璐)